

20世纪60年代中国体育外交回顾

张晓义 李光欣

(吉林大学体育学院, 长春 130012)

摘要: 运用文献资料法对20世纪60年代中国体育外交进行回顾,旨在总结历史经验与教训,为今后我国体育外交工作提供借鉴。20世纪60年代中国对外战略进行了重大调整,“反帝反修”战略形成。在这一大背景下,体育外交以打破国际封锁为目标,采取了加强与社会主义国家和中间地带国家交往等措施,承担着维护国家利益和服务于国家外交战略的任务,并为此做出了巨大贡献。新时期体育外交工作应正确把握国家利益,淡化意识形态分歧;发挥体育对外援助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 体育史; 体育外交; 20世纪60年代; 中国

20世纪60年代,中国的对外战略进行了建国以来第一次重大调整,其特点“一是继续坚持建国以来的反对美国和其他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战略(即‘反帝’);二是从60年代开始明确提出的反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战略(即‘反修’);三是60年代中期开始主张世界‘一片红’,支持亚非拉各民族解放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略(即‘世界革命’)”^[1],史称“反帝反修”战略。调整后的战略对中国体育外交产生了哪些影响?体育外交方向性的调整产生了哪些历史影响?这对我们目前体育外交工作有何启示?围绕这些问题,本文进行了回顾与分析。

1 我国国家利益与“反帝反修”战略的形成

1956年2月的苏共二十大会议,赫鲁晓夫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引起震动。尽管如此,毛泽东在1957年2月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会议上提出:“巩固同苏联的团结,巩固同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这是我们的基本方针,基本利益所在。”^[2]但中国的

这些努力并没有改变苏联大国沙文主义政策的继续推行。1958年4月,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斯基致函中国国防部长彭德怀,提出共同建立一座大功率长波电台,并坚持由两国共同建设和共同管理;同年6月,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在求见毛泽东时以赫鲁晓夫的名义提出共同建立一支潜艇舰队,毛泽东说:“你们把俄国的民族主义扩大到了中国的海岸。”^[3]在此后中国炮轰金门、马祖和中印边界冲突中,中苏表现出了不同的战略利益,从苏联的态度来看,它企图将中国纳入其全球战略的框架中而不顾中国的利益。从1960年夏天开始,苏联在我国边境不断挑起事端,如策划了大规模的颠覆活动,入侵中国的七里沁岛、珍宝岛、新疆铁列克提等地。这些事件的发生使中国改变了建国初期“一边倒”的战略,走向了打击美帝国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的“反帝反修”战略。

面对与苏美为敌的局面,中国需要来自其他方面的国际支持,建立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以此抗美援朝。为此,毛泽东在分析国际局势的基础上提出了“两个中间地带”的战略思想。毛泽

第1作者简介: 张晓义(1974-),男,山东潍坊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体育外交与体育史研究。
Tel: 13596180082, E-mail: zhangxiaori1974@jlu.edu.cn。

东在 1963 年 9 月 28 日的中共中央会议上提出：“我看中间地带有两个，一个是亚、非、拉，一个是欧洲。”1964 年 1 月 5 日毛泽东与日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听涛克己谈话中指出：“中间地带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指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经济落后的国家，一部分是指以欧洲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同年 7 月 10 日毛泽东同日本社会党人士的谈话中明确指出了“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一个中间地带；欧洲、北美加拿大、大洋洲是第二个中间地带。日本也属于第二个中间地带。”^[4]中国的对外战略就是依靠第一中间地带，争取第二中间地带。

2 “反帝反修”战略下的中国体育外交

2.1 体育外交目标：打破对中国体育的国际封锁

在此历史时期，中国与美国的关系继续恶化，中苏交恶。在国际体坛中，中国只与国际乒联保持着正常联系，中国体育受到了严重封锁。在这种局势下确立的体育外交目标是打破对中国体育的国际封锁。在此段时期，中国对外战略受到世界革命理想的驱动，将中国革命的利益与世界革命的利益联系在一起。其认识基础是：广大亚非拉各族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和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是一致的。这种认识基础的来源是中国领导人对国家形势的估计：美国和苏联对中国构成严重威胁，存在爆发世界大战的可能；广大亚非拉国家革命斗争广泛开展，世界革命形势发展良好。受此影响，1968 年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会议第十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会提出“一切被美帝国主义、苏联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所压迫的人们，应当结成一个广泛的统一战线，彻底粉碎美帝、苏修妄图霸占世界的阴谋，以便更迅速地取得自己的胜利和解放。”以此为指导思想，“1962 年国际体育活动的安排要压缩数量，保证重点，保证质量，很好地配合我国外交斗争……”^[5]“努力做好国际体育工作，坚决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宣传毛泽东思想，扩大我国政治影响”^[5]，以打破国外反动势力对我国体育的封锁，服务于中国的对外战略。

2.2 体育外交措施：加强与社会主义国家和中间地带国家的体育交往

2.2.1 加强与社会主义友好国家的体育交往

尽管受到极“左”的影响，中国的对外战略一度受到严重破坏，但体育的国际交往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小，因此文化大革命以前我国的体育外交还是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中国同民主德国、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越南、朝鲜、蒙古等社会主义国家间的体育交往频繁。中苏之间尽管存在着严重的分歧，甚至在中苏边境发生冲突，两国体育间的交往依然进行，只是次数明显减少。1960 年中苏之间的体育交往，除了参加社会主义国家间举行的多国比赛外，重要交往次数达到了 20 次之多；但从 1961 年开始到 1965 年，两国之间的体育交往次数更为减少；1965 年至 1969 年没有重要交往^[6]。

2.2.2 加强与第一和第二中间地带国家的体育交往

“国际体育活动必须密切配合我国外交斗争，增进与各国人民和运动员之间的友谊，交流技术经验，注意加强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的来往，根据不同对象，适当宣传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各项成就，扩大我国政治影响，为国际斗争、为我国体育运动的普及与提高服务。在组织国际比赛中，应加强对我方人员（包括观众）的政治思想工作，以团结友谊为重。”^[5]从 1960 年开始，我国与缅甸、柬埔寨、巴基斯坦、尼泊尔、古巴、叙利亚、印度尼西亚、印度、几内亚、索马里、乌拉圭、加纳、锡兰（今斯里兰卡）、刚果（布）、突尼斯、中非共和国、坦桑尼亚、阿根廷和墨西哥等亚非拉国家进行了体育交流，并对非洲一些较为贫困的国家进行了体育的对外援助工作。在此期间我国参加和举办了一些洲际性和国际性赛事，如第 26 届世乒赛、新兴力量运动会和亚洲新兴力量运动会等，在此时期产生了重大的国际影响，特别是新兴国家成立的国际体育组织和举行的新运会和亚新会，使国际奥委会认识到用强权压制和封锁第三世界国家的时代已经结束，给了国际奥委会以沉重打击。除此之外，中国还与法国、英国、日本、比利时、荷兰、挪威等第二地带国家展开了体育交往。

2.3 体育外交的成就

此段历史时期，为国家利益服务依然是中国体育外交的指导思想，其政策和措施的选择紧紧

围绕着中国对外战略目标,其外交措施与行动很好地体现了对外政策。中国体育外交与中国的对外战略密切相关、密切呼应,它把自身的发展纳入到国家的对外战略框架中,为配合国家对外战略的实施、实现和维护国家利益做出了重要贡献。

受国家对外战略的影响,中国体育加大了与社会主义国家的体育交往,进行了争取两个中间地带的体育交往。这些体育之间的交往使中国“扩大了国际体育往来,与22个国家进行了85次友好活动,增进了友谊,宣传了我国大跃进的成就,坚决反对了一些国际体育组织搞‘两个中国’的阴谋,各项体育事业的发展,对增强人民体质,支援国防建设,促进生产、工作、学习,都起到了良好的作用。”^[5]由于第三世界国家刚刚获得独立,面临的困难较多,其发展需要外界的大力帮助,此种情况下,中国体育进行了对外援助,揭开了中国体育对外援助的历史新篇章。同第三世界国家的体育交往促进了中国与亚非拉国家之间的友谊,为顺利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打开外交新局面、获取第三世界国家的支持、加快中国重返联合国进程、宣传中国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做出了贡献。在与第二个中间地带国家的交往中,“增进了与此之前已经建立的瑞士、瑞典、丹麦、挪威、芬兰等国的友谊,而且同法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同意大利和奥地利互派了商务代表。中国积极的外交行动,在与西欧的冷战屏障上打开了一个缺口”^[7],在此过程中,体育外交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与努力,同时,在与日本的民间交往中,体育外交也为以后两国的建交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综上所述,在“反帝反修”时期,中国虽中断了与国际奥委会和大部分国际单项体育组织的联系,但通过与国际乒联的联系,努力开展体育对外交往活动,以打破封锁、改善中国的国际地位。在此历史时期,中国的乒乓球与“新运会的举办无疑为新中国运动员创造了一个在国际体坛上展示自我力量的机会,是中国体育在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走向世界的一块里程碑。”^[8]这些成绩的取得一方面引起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另一方面提醒了以国际奥委会为首的国际体育组织不能无视中国的存在,这种从思想上、组织行

动上的挑战,提高了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对国际社会产生了巨大冲击。可以说,中国通过举办和参加世乒赛、新兴力量运动会、亚洲新兴力量运动会,加强了同第一和第二中间地带国家的关系,加强了同日本与西欧国家的友好关系,这为中国外交局面的打开、获取第三世界国家的支持、加快中国重返联合国进程做出了重要贡献。

2.4 文革对体育外交的影响

由于受到极“左”思潮的影响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中国将阶级斗争从国内扩大到了国际,特别是从1966年8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中国将大部分驻外大使和使节召回,参加文化大革命,而且中国的外交以宣传毛泽东思想和文化大革命为主要内容。这严重影响了中国的对外关系,并出现了诸多外交纠纷,使“中国的外交在1966—1968年两年多的时间里,受到了极左思潮的严重干扰。这期间不但没有一个国家同中国建交,而且中国的外交关系几乎处于中断。”^[9]因此中国为实现国家利益方面的战略存在着错误或偏差,致使在国家战略的制定和实施方面没有完全服从于国家利益,甚至损害国家利益的实现。“这一战略将推进世界革命,单纯追求意识形态利益,作为唯一的国家利益,以意识形态冲击了国家安全利益,冲击了国家经济利益。中苏两党由于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扩大到了国家关系,从而造成中苏两国关系的恶化;中美两国关系由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区别仍然处于相互敌视之中;中国把自己视为世界革命的中心,并向全世界推进革命。”^[10]在我国国家实力较弱的情况下同时与苏美抗衡限制了中国的外交空间与利益的拓展,使中国的安全环境更加恶化。受此影响,1966年的国际体育交流次数较往年大幅下降,1967年只有越南体育代表团访问中国,1968年体育的国际交流中断,1969年只与越南、刚果(布)、阿尔巴尼亚进行了为数不多的小规模的体育交流活动。

可以看出,由于对国家利益的判断出现了误差,中国体育外交受到了影响。虽从体育外交本身来说,其目标、措施、行动还是一以贯之的,但是对国家利益的误判影响了战略思维及战略的制定,因此,中国体育外交实施的结果就出现了偏差。

3 启示

3.1 正确把握国家利益, 淡化意识形态分歧

20世纪60年代的对外战略中将意识形态利益凌驾于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利益之上, 过分强调了意识形态的差别, 没有寻求利益共同点, 使中国经济上失去了国际上的援助; 而政治上同时与苏美对抗, 使中国的国家安全利益受到威胁。受此影响, 中国与国际体坛特别是国际体育组织的联系中断, 中国体育失去了与主流体育文化交流与学习的机会, 使中国体育的发展蒙受了损失。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和平崛起的今天, 我们要深切认识“国家利益是一国对外政策的出发点。这一点有两层意思: 一是国家利益是对外政策的目标, 国家制定对外政策就是要实现或维护国家利益; 二是对外政策只有有利于国家利益才具有合法性。”^[11] 但此段历史时期, 我们过分夸大了体育的政治作用, 一度使体育沦为政治的附庸, 淡化和忽视了体育的其他功能, 阻碍了体育事业的正常发展。我们要吸取教训, “要寻求体育为政治服务的恰当方式和方法, 使体育与政治的联系从刚性联系转变为柔性联系。”^[12] 因此中国体育外交要总结经验、吸取教训, 淡化意识形态的分歧, 多找共同利益的契合点, 要从长远的战略观点出发, 不过分计较意识形态的差别, 扩大共同利益的汇合点, 妥善解决彼此间的分歧, 积极主动地融入国际体育中去, 确保国家利益和体育利益的实现。“一个国家只有在它放弃了一种政治信条所带有的十字军精神之后, 才能对自己的国家利益采取一种理性的态度。”^[13]

3.2 要发挥体育对外援助的重要作用

对外援助是大国实现其国家利益的重要途径, 正是对外援助让新中国迎来了建国以来的第二次高潮, 促进了新中国外交局面的改善, 对巩固国防、提高新中国的国家地位起到了重要作用。对外援助是中国外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体现了中国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对外援助八项原则, 增进了中国同亚非拉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 加强了同亚非拉国家人民的友谊和团结。在中华民族

走向伟大复兴、中国和平崛起的历史征程中, 在建设体育强国的当下, 要继续发挥体育对外援助的作用, 在把握国内外形势变化和中国体育自身实际的情况下, 从国家利益的高度制定对外援助政策, 增强中国在国际政治领域和国际体育领域的行动能力, 以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 为中国的和平崛起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参考文献:

- [1] 楚树龙, 金威. 中国外交战略和政策[M]. 北京: 时事出版社, 2008:96.
- [2] 毛泽东选集第5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7: 344-345.
- [3] 韩念龙. 当代中国外交[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113.
-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外交文选[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9:506-509.
- [5] 国家体委政策研究室. 体育运动文件选编(1948-1981)[M]. 北京: 人民体育出版社, 1982.
- [6] 以国家体委编, 人民体育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中国体育年鉴》(1949-1991精华本上册)的“大事记”为依据.
- [7] 李少军. 对外战略报告[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583.
- [8] 伍绍祖.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史[M].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1999.
- [9] 李宝俊. 当代中国外交概论[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123.
- [10] 高衍玉. 论中国国家利益的实现[D]. 山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2007:23.
- [11] 阎学通, 阎梁. 国际关系分析[M].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68.
- [12] 张岩. “体育与政治一体化”质疑[J]. 体育科学, 1989(2):1-4.
- [13] 汉斯·摩根索. 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M]. 第七版.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587.